二战后中国向日本索赔秘闻

日本发动的八年侵华战争，给中华民族造成了空前的巨大的灾难。据国民党政府行政院 1946 年 10 月的不完全统计，中国军民死伤 1040 万人，公私财产直接损失 313 亿美元。据最新资料统计，中国军民死伤 3500 万人，直接财产损失 1000亿美元，间接财产损失 5000 亿美元。日本战败后，理应向中国赔偿。国民党政府起初也曾积极要求日本索赔，最终还是不了了之……

开罗会议后，国民党政府就开始考虑战后索取日本赔偿的问题。1943 年 11 月 4 日，中国驻苏使馆转回苏联瓦尔加教授所著的《希特勒国及其同伙赔偿损害问题》一书，蒋介石遂令参事室研究。1944 年 2 月 14 日，参事室主任王世杰研究后认为，苏联所拟“赔偿责任以及赔偿办法，除先尽物资损害赔偿，然后再赔偿身体损害一点外，均有利于我国。因之同样可适用于日本。”3 月 19 日，参事室外交组黄正铭草拟了《战后对日媾和条件纲要》，指出：日本除对我军费赔偿外，还应以四种方式对我予以经济赔偿。

日本投降后，国民党政府为充实内战实力，对赔偿一事十分积极。1945 年 9 月 13 日,当时的中国外长王世杰和美苏两国外长换文，表达了中方对赔偿问题的看法。10 月和 11 月，蒋介石令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长王宠惠约集行政院及内政、经济、外交各部代表，两度会商研讨索取赔偿的具体办法。在 11 月 3 日的讨论中，朱绍阳等人提出还应要求日本赔偿战费，而王宠惠则力主实物赔偿，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认为赔款是旧观念。其提出的理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的赔款并非以战胜国的战费为依据，而是以德国的赔偿能力为基础；现在如对日本要求赔偿战费，则战费数字过大，日本必无力赔偿。同时各国分别提出战费数字，争论势不可免，争论之后绝无结果。上次大战后，德国也以赔款为主，但没有切实执行。因此，英、美、苏在雅尔塔会议上决定，用德国的工业潜力来抵偿赔款，办法就是拆除德国的工厂和每年以一定的实物赔偿。



1943 年 11 月 22 日,中英美三国首脑蒋中正、丘吉尔、罗斯福以及蒋夫人宋美龄在开罗会议期间会晤

11 月 13 日，外交部又约请 12 个部的代表研讨，最后通过了《关于索取赔偿与归还劫物之原则之办法》,规定：

（1）日本对我赔偿以实物为主；

（2）中国和其它国家相比，受害最巨，故对日索取各项赔偿，

应有优先权，如盟国实行总额分摊，中国应占日本赔偿总额之过半；

（3）凡在中国境内之日本公私财产，悉数归属中国政府，以作赔偿之一部；

（4）日本境内宜充赔偿之各种实物，应交中国以作赔偿之一部，这些实物包括军需工业及重工业工厂设备；

（5）日本每年应将若干原料和产品，在规定年限内分期定量运交中国作赔偿之一部。

从 11 月 29 日起，由行政院主持办理。内政部“抗战损失调查委员会”改名为“赔偿委员会”，改隶行政院，主任翁文灏。

索赔成功与否，并非中国一厢情愿，它还取决于盟国的态度。为处理战后的日本问题，1945 年 12 月 27 日，莫斯科三国外长会议决定成立以下委员会：

（1）远东委员会。由中、美、苏、英、法、菲、澳、缅、印度等国代表组成，总部设华盛顿。中国派出的代表是李惟果、马则民等，由驻美大使顾维钧任代表团团长。

（2）盟国对日委员会。总部设东京，主席由驻日盟军总部最高司令麦克阿瑟担任，另由中、苏、英各出一名代表组成。该委员会主要协助最高司令部执行投降条款、对日实行占领和管制。由于规定“在任何情况下，必须由最高司令作出决议，唯有他履行盟国在日本的执行权”，因此，负责制定对日政策的远东委员会实际上所起的作用非常有限。在美国单独占领日本的情况下，美国的态度更是举足轻重。

战后，蒋介石奉行亲美反共的外交政策，为求得美国援助大量的内战经费，在赔偿问题上，唯美国马首是瞻，即使美国的做法损害了中国利益，也只能忍气吞声。不过，当时蒋介石最关心的是，如何分配日本的残余舰艇，以增加内战资本

1945 年 10 月 1 日，国民党政府就向盟国提出，“日本海军设备、航空工业生产设备，拟由我方接收，作为抵偿损失之一部”，并令驻美大使魏道明多次与美洽商。经反复交涉，最后由中美苏英四国平均分配。从 1947 年 6 月 24 日起，四国代表在东京分四次抽签。前三次抽签，中方共分得驱逐舰、护卫舰、运输舰 24 艘。前二批抽得的 16 艘开抵上海港，由海军少将方莹接收；第三批 8 艘开抵青岛；第四批开抵台湾左营港，由海军第三基地司令黄绪虞接收。所分舰只全系小型，总吨位不足 5 万吨。

根据国际惯例和美国的要求，国民党政府将在华接收的日本产业作为赔偿中国损失之一部。1946 年 6 月 13 日,通过了《接收国内日本产业赔偿中国损失记帐办法》，规定战利品、伪组织的财产不在赔偿之列。据统计，日本在华资产可供赔偿者约 3.5 亿美元。国民党政府在东北只接收到日本在东北资产的 1/5。

在日本赔偿的核心问题即实物赔偿上，各国意见不一。美国起初主张处理从严。1945 年 12 月 19 日，美国赔偿专员鲍莱在考察日本、朝鲜和中国东北后提出报告，主张将日本工业限制在 1926 年——1930 年时的水准，其余工厂均尽速拆充赔偿。苏联提出，对所有日本国外财产的处理，不在远东委员会职权范围内，否则拒绝参加赔偿会议。此议遭到其它国家的反对，后美与苏妥协，终以苏联在中国东北等地运走的器材不列入赔偿。将日本工业限制在何种水平，以及赔偿分配的办法，是远东委员会长期争论不决的问题。中国方面主张，日本工业应限制在进行侵略战争前的水平，拆迁的工厂设备，中国不应少于 50%。鉴于运输能力不足，中方所分工厂希望三年内由日方代管，或在日本利用当地劳力，由中国经营。

根据国际惯例，整个赔偿问题的解决，必须在对日和约中敲定。当时，战胜国都急于利用日本工业来复兴本国经济，于是在 1946 年初，远东委员会通过了临时拆迁方案将盟军总部管制下的日本工厂先作部分拆迁。同年 5 月和 8 月，根据划定的 12 项工业范围，公布了可作赔偿的工厂名单，并规定拆迁工厂总数的 30% 作先期赔偿。据此，盟军总部成立了赔偿执行处，由哈里逊任处长。日本方面则成立了赔偿厅，由山口任厅长。国民党政府派出由恽震等 5 人组成的赔偿小组赴日调查。碍于远东委员会办事迟缓，从 1946 年 9 月起，国民党政府一再要求美国单独行动，执行先期拆赔。1947 年 2 月 14 日，美国向远东委员会提出日本赔偿先期交付案，准许在先期拆充赔偿的 30% 中，中国取得 15% ,英国、荷兰、菲律宾各取 5%。到 3 月底，远东委员会讨论尚无结果。于是，美国遂对盟军总部下达指令，实施该方案。这样，中国共运回工厂设备三批。第一批是机床工具类，共 7686 部,重 52034 吨；第二批是试验设备类，共 1690 具，重 735 吨；第三批是机电设备和剩余设备类，其中有 1.5 万千瓦蒸汽发电机一

套，450 千瓦的柴油发电机等，重 661 吨；炼钢平炉、各种马达 839 具，重 19166 吨。第三批于 1949 年 5 月运到台湾基隆。

最初，美国对国民党政府向日本索取赔偿还是给予了一定的支持。例如，1947 年 9 月远东委员会分配各国摊赔额时，决定中国占 30%，美国表示，愿将自己所获的 6%也给予中国。美国如此“慷慨”，其目的在于扶蒋反共，帮助蒋介石取得全国政权，并以此抵制苏联在东方的影响。到 1947 年下半年，美国目睹国民党在内战中惨败，对国民党已不抱太大的希望。这时，美、苏矛盾日益显露，美国决定实施“马歇尔计划”，拟通过援助希腊等国以抵制苏联在欧洲的影响。在东方，美国开始考虑日本未来的地位和作用，因此对索取日本赔偿已不热心。

1948 年 1 月 6 日，美国陆军部部长罗亚尔明确表示要扶持日本，使之成为“防御今后远东方面的新的共产主义威胁的堡垒”。随后，美国就放弃“鲍莱计划”，置远东委员会方案于不顾，同意陆军部部长的“斯揣克方案”，认为日本战争能力已被消除，其余工业应于保存。驻日盟军总部便干扰、拖延并最终于 1949 年 5 月中止了拆迁工作。这样，国民党政府只获得先期允诺分给中国 15% 中的极少部分，成了象征性的偿付。

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不惜一切地扶持日本，坚决主张各盟国放弃赔款要求，以与日本缔结和约。此举遭到许多国家的反对，菲律宾、法国、印尼分别坚持 80 亿、20 亿、40 亿美元的赔偿。这时，国民党置身孤岛，态度更趋软弱。1950 年 12 月 19 日，台湾当局由顾维钧向美国提出，“如他国坚持赔款而能得之，我亦不能完全放弃”。美国远东顾问杜勒斯出访菲律宾、法国等国，一面施加压力，说提出赔款是不现实的，一面又以答应美援堵住菲律宾等国强烈的赔款要求。

1951 年，英国正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并于同年 5 月邀请新中国参加对日和约。这令蒋介石忐忑不安。6 月 18 日，蒋介石发表所谓声明：“中国对日本不采取报复主义，而应采取合理的宽大政策，并以种种直接间接办法求取对日和约及早完成。”台湾当局行政院第一〇三次会议研究认为，英国、印度业已承认大陆政权，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已向美国表示不应由台湾与日签订和约，台湾能否与日订约，“实于美国及日本的态度，我如坚决要求赔偿，既难望美国之支持，自亦非日本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所愿，势增加我参加和约之困难”。于是决定，“酌情核减或全部放弃”。在美国一手导演下，拒绝新中国参加，于 1951 年 8 月 13 日在美国旧金山通过了片面的《对日和约》。条约的第十四条，承认日本“应对它在战争中造成的损害和痛苦给以赔偿”。但接着又说，“日本的资源目前还不能够全部赔偿这些损害和痛苦”，有关国家可以直接和日本谈判，日本可以给予必要的劳务赔偿。这实际上取消了日本的赔偿。

8 月 15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长周恩来发表声明，指出：“和约草案拒绝战胜国中国参加，并取消了日本的赔款，这是违反国际协定的。”台湾国民党当局对自己未能参加和约草案的签订也表示了抗议，但对和约取消赔偿一事只字不提。

1951 年 9 月以后，有日本方面欲与新中国签订双边和约的传闻，美国为反对新中国遂迫使日本与台湾当局订约。蒋介石为摆脱困境，提高自己的国际地位，勾结日本共同反共，便不惜放弃赔偿，讨好日本，以与日缔约。1952 年 2 月 19 日，台湾当局“外长”叶公超毫不讳言地说：“中日是不是共同反共，确立了这个大前提之后，则不论全面媾和也好，单独媾和也罢，和约吃些亏亦是不足议论的。”

2 月 20 日，日本派代表到台湾会谈。在谈判中，台湾当局试探可否根据旧金山和约精神，取得日本的劳务赔偿，但日本代表稍加反对，台湾当局即放弃索赔的要求。结果，“中日和约”议定书第一项乙款竟写明：“为对日本人民表示宽大与友好之意起见，中华民国自动放弃旧金山和约第十四条甲项第一款日本国所应供之服务之利益。”

台湾当局此举极大地伤害了当时全国人民的感情，损害了中华民族的利益，连台湾学者也无不哀叹，血战八年的中国，在日方的坚持下，所争得的只不过是自动放弃的极度“宽大精神”罢了。蒋介石集团为了一党私利，竟放弃民族尊严和利益于不顾。就连菲律宾、印尼、缅甸、越南等国在“旧金山和约”后，都表示保留要求赔偿的权利，事实上日本事后也先后向上述国家赔付了大约 10.12 亿美元。相形之下，岂不令全中国人民愤慨！

其实，赔款的意义已超出了经济的范围，具有道义的和政治的责任。那么，日本是否会铭记台湾当局此举的“恩德”呢？日本代表河田当时在谈判中就说，以日本

人在华“巨额资产作为贵国之赔偿，已属难能”，“今以善良人民私有财产皆悉数充作赔偿，在国际惯例上，尚属创举”。言下之意，非但毫不表示感谢，反而认为放弃索赔要求，乃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许正雄）



潜艇是一种既能在水面航行又能在水下一定深度航行的作战舰艇。它已成为世界上军事强国的海军主要力量之一。潜艇的出现可追溯到 200 年前的美国独立战争时期，那时的潜艇由于非常简单和不实用，以至于它对自己艇员的威胁比对敌人的威胁还大，而不被人们所关注和了解。



现代潜艇的出现，只能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不远算起。潜艇的地位和其所发挥的巨大作用，也正是由于它在一战中的出色表现而被人们所认识。后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潜艇的赫赫战果，不仅进一步确立了潜艇的地位，而且使它成为海军的一支主要兵力。

1914 年 8 月 4 日，英国对德国宣战。德国海军尽管明白英国海军处于明显的优势，但并无意就此把胜利让给它的对手，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海战就此拉开了序幕。

英国舰队在 8 月 4 日晚 11 时接到对德开战信号后，即进入“北海”出口的阵位区，封锁德国舰队，并在那里等待德国人“送货上门”。这是英国人历次海战中的惯用做法，以此获得制海权。 6 日拂晓，10 艘德国潜艇向西北方向驶去，这不仅是为了完成侦察任务，而且是一次旨在尽可能多地击沉敌战舰，从而粉碎英国海军的作战计划及信心的大胆行动。在这次搜索侦察中，德国潜艇不仅一无所获反而损失了两艘，其间甚至对英国主力舰位置的情报也没搞清楚，但对英国人也很难说取得了什么胜利。这次行动，对双方来说都具有深远和重要的意义。对过去猜想潜艇具有一种恐吓的威慑能力，现在算是明白

了。因为它是能在远距离的敌方水域单独作战而不需要支援的战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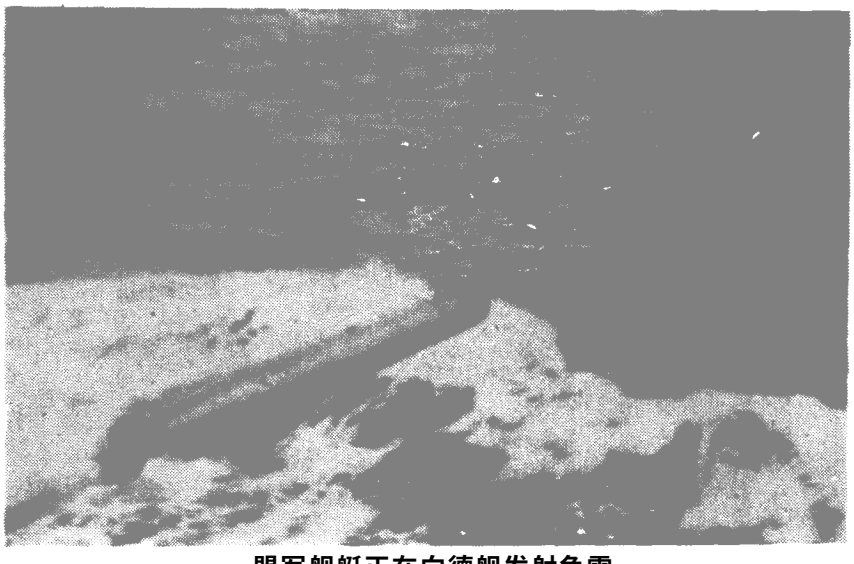
在以后的几个星期中，德国潜艇加紧了巡航，而且它们敢于远航到英国的海岸。这几个星期的远航虽无战果，却使英国皇家海军感到十分担心害怕。英国舰艇上的官兵，开始体验到潜艇战所产生的令人忐忑不安的恐怖作用；而这种恐怖作用在战前，只有最有远见的人才朦胧地觉察出来。总之，英国人有点神经过敏了而今，他们非常担心地盯着大海，甚至有时似乎看到了潜艇而潜艇根本不在那里，简直是到了疑神疑鬼，神经错乱的地步。他们在设想如果认为没有潜艇而一旦撞上潜艇时，将会产生多么可怕的损失！这种担心，到开战一个月后的9月5日，被证明不是多余的了。英舰“开路者”号在海上巡逻时，突然被一枚鱼雷击中，随舰250多名官兵葬身鱼腹。击沉英舰的德国U—21潜艇安然无恙，成为本世纪或自现代潜艇诞生以来第一次击沉一艘军舰的潜艇。如果这次损失还不足以吓住皇家海军的话，那两个星期后的另一次更可怕的灾难降临到英国人头上，其结果就不一样了。



德军潜艇浮出水面，袭击盟军的水面舰艇

9月22日拂晓，有3艘英国巡洋舰“阿布柯”号、“霍格”号和“克雷西”号正在离荷兰海岸大约20英里的海面成横队缓慢地航行。一艘德国老式的柴油机潜艇U—9，因机器故障被迫返航，偏

离了很远的航向，以致偏航到这儿来了。这纯粹是一种偶然的巧合。U—9 潜艇为了给电池充电，浮出水面，正好发现远处巡洋舰迎面而来，立即潜到潜望深度，准备攻击。英国巡洋舰并没有意识到将要发生灾难，以 2 海里间隔编队向前航行。 6 点 20分，居中的“阿布柯”舰的右舷突然被从 500 码外射来的鱼雷击中，当即就动弹不得，并开始严重倾斜。其余两舰以为“阿布柯”号触雷了，赶忙前去救护，它们放下救生艇抢救幸存者。这时，“阿布柯”倾覆下沉了。6 点 50 分，有两枚鱼雷击中巡洋舰“霍克”号，引起了巨大的爆炸。U— 9 艇此时浮出水面，而且离它的第二个牺牲者不远。“霍克”号发现了潜艇并对它猛烈开火，然而毫无作用。到 7 点 05 分，这两艘舰都完了，但“克雷西”号还在拼命抢救幸存者。几分钟后，当它发现德国潜艇的潜望镜，决定躲避已经为时太晚了，两枚鱼雷中的第一枚击中了它，紧接着，第二枚鱼雷就把它送到了海底。整个战斗 1 小时不到，3 艘 1.2 万吨的战舰毁于一条老式潜艇之手。



盟军舰艇正在向德舰发射鱼雷

此后又出现的几次险情，使得英国的主力舰队撤出封锁阵位，一直撤到英国人认为不受潜艇威胁的海域去了。一艘老式的小潜艇就使两个月前英国海军封锁出海口和寻求海上决战的方式得到改变，那是不是战列舰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了？是不是潜艇已

成为海上力量新的主宰了呢？

这两个问题，在后来的日德兰海战中找到了答案：证明战列舰时代并未结束，现代海上强国之间已不可能通过几次海上决战解决问题，而潜艇的威力，并不像开始时那么可怕。这有几个方面的原因：

1 潜艇航速远低于水面舰艇；

2 潜艇观察、通信困难，独立作战时没有情报保障，战果的随机性很大；

3 水面舰艇注意采取防潜措施，比如进行高速曲折航行；

4 反潜装备开始出现，水听器和深水炸弹终于发明了。

水听器是一种能测定在非常安静环境下潜航的潜艇位置的水声设备。它所提供的定位精度还不够高，以致不能有效地使用深水炸弹，但使潜艇在攻击舰艇时的危险增大了。这就迫使德国潜艇的攻击转向另一种重要的无抗击能力的目标——商船。

德国使用潜艇来袭击商船，被列为一战中最重大的事件。这个事件在道义上的问题姑且不论，但军事上的效果是令德国人陶醉的。从德国潜艇转入攻击商船，直到1917 年 7月，英国商船的损失几乎到了把英国整垮的地步，是由于美国参战和采用了护航运输队，才使得商船的损失开始下降，潜艇的损失上升。德国的这场袭击商船战一直延续到 1918 年秋战争结束。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德国的失败而告终。海战战场也失败了。从某种意义上说，海战的失败，是德国人把潜艇的作用看得过高的缘故，认为潜艇战是一种能单独赢得战争胜利的手段，但是不能否认潜艇战几乎达到了这一目的。通过一战中潜艇战的整个过程来看，潜艇在战争武器中已经显示出它的特殊的重要作用了，可是英国人从他们的灾难中和得救中并没有得出令人心安的结论。在两次大战之间的几年中，英国人惊魂始定，但心有余悸，一直迫切要求废除潜艇，并提出了如不废除潜艇也要予以限制的要求。这只能是英国人一厢情愿的幻想。要想使这种武器成为非法是不可能的，而最明智的做法是要拥有最优良的潜艇，以及研制某种水面舰艇所使用的有效的反潜武器。

此时，英国人发明了一种比水听器更为先进的设备——声纳。可是，声纳在反潜作战中能否起到关键作用，仍是一个有待解决的问题，不过它在揭开潜艇“隐身术”这一最大法宝方面迈出了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实质性的一步。英国人对“神秘的”声纳的依赖，使得他们对潜艇的威胁感到比以前放心了，认为潜艇不再是那么一种简直无法对付的武器了。事实表明，这是一个极其轻率的错误估计。

曾于一战中在潜艇上服过役的邓尼茨上校，被委派为新成立的德国潜艇部队司令。他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英国迟迟才采用的护航制度，之所以能挫败德国潜艇，乃是由于德国潜艇战术没有随着情况的改变而改变。他说，对付护航队的办法是采用“狼群战术”，即把潜艇集中起来编成队群作战。小型、快速以及机动性能优异的德国潜艇运用这种战术是很理想的。因此，邓尼茨希望尽快地建造 300 艘这样的潜艇德国战前的海军战略和海上政策，都是从这样一个前提出发的，即建造、训练和使用潜艇，主要是为了破坏敌人的海上交通线，而且首先对付当时占世界商船吨位 31.8%的英国。

1939 年 9 月，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由于与英国海军实力存在巨大差距，德国海军要避免与英国进行海上决战，所以把攻击目标指向英国商船

9 月 3 日，英国对德宣战。同日，美国客船“雅典”号被德国潜艇击沉。9 月 14 日，德国潜艇袭击英国航空母舰“皇家方舟”号未遂，但在 17 日击沉了英国航母“勇敢”号。一个月 以后，德国 U—47 潜艇又击沉英国“王橡”号战列舰。当然，像这样的机会以后是不会重复出现的，邓尼茨也不期望在这方面给敌人以毁灭性的打击。其实这都是德国潜艇在执行主要任务时——破坏商船——在航渡时顺便取得的战果。

此时，英国舰艇早已装备声纳，那为什么德国潜艇在对付声纳方面没有遇到什么困难呢？首先，声纳并不像德国人曾经担心过，以及英国人曾经充满信心地期望过的那样可怕。声纳很容易把水下其它物体误认为潜艇，鲸鱼就可能是这样的例子。声纳即使探测出一艘潜艇，但提供深度的数字很不精确，这就意味着深水炸弹很可能投掷到对潜艇无所损害的地方。其次，声纳不适用于舰艇在水面搜索更为重要的小目标。英国人开始一直以为德国潜艇的大部分攻击会在白天潜航状态中进行，后来他们出乎意料地发现，邓尼茨采用了 1918 年研究的“狼群战术”。当时，英国船队由于用了大量护航船只来保护，所以潜艇在白天进行水下攻击也是危险的，邓尼茨的答案是在晚上

进行水面攻击。德国潜艇的水面航速比绝大多数商船要快，再加上它的外形轮廓低矮很难被对方发现，而且在水面航行不易被声纳发现。因此，有可能避开护航船只，直插护航船队的心脏。具体战术是：当一艘德国潜艇发现护航船队时，它就发报给邓尼茨在法国的作战指挥部，指挥部得知后，立即通知并引导附近的潜艇；同时，发现商船的潜艇则死死盯住护航船队不放，等潜艇到齐后，集结的“狼群”就一齐猛烈攻击护航队。潜艇的战斗部署，是根据当时所出现的情况，以及指挥部根据源源不断送来的敌情报告而定下的决心进行的。这就是有名的“狼群战术”

1940 年 10 月 18 日和 19 日的海战，是作为早期潜艇战胜护航队的骇人听闻的史实而传之于世的，也是“狼群战术”一次最成功的运用。



盟军海军向德军潜艇发射鱼雷

由 35 艘船只组成的 SC—7 护航队，从加拿大出发向东航行进入大西洋西部通道。船队在 2 艘巡洋舰和 1 艘护卫舰护航下，平安无事地度过了 1940 年 10 月 16 日夜晚。可是，17 日德国 U—48 潜艇发现了这支护航船队，并报告指挥部，于是附近的 6 艘 潜

艇也急速前来截击。17 日下午 4 时,从 U—48 首先攻击开始,一直到 18 日之后的黎明撤出战斗,去袭击另一支护航队止,共击沉商船 20 艘,击伤 2 艘。

10 月 19 日,一支由 49 艘船只组成的 HX—79 护航船队,从某地出发,后于 SC—7 护航队两天也到达大西洋西部通道。这个船队大约有 10 艘护航舰,但对后面紧紧跟踪的 U—47 潜艇一无所知。当日黄昏,“狼群”集结完毕,刚过 9 点,攻击开始了。德国潜艇像射击在水面浮游的鸭子那样来射击目标。一夜之后,HX—79 护航队有 17 艘船只被击沉,而辛苦了几天的德国潜艇安然无损地扬长而去。

从这之后,同盟国的处境再不会遇到像德国“黄金时代”所出现的那种阴暗局面。但是,斗争是在双方都没有占上风的情况下进行的。为对付德国潜艇未曾有过的扩张,护航制度改进了,而且所有船队在横渡大西洋的航线上都有了护航。同时,同盟国在反潜技术方面也变得更加富于想象力。他们充分利用侦听来的德国潜艇的电报,并且开始用雷达装备的飞机来回击敌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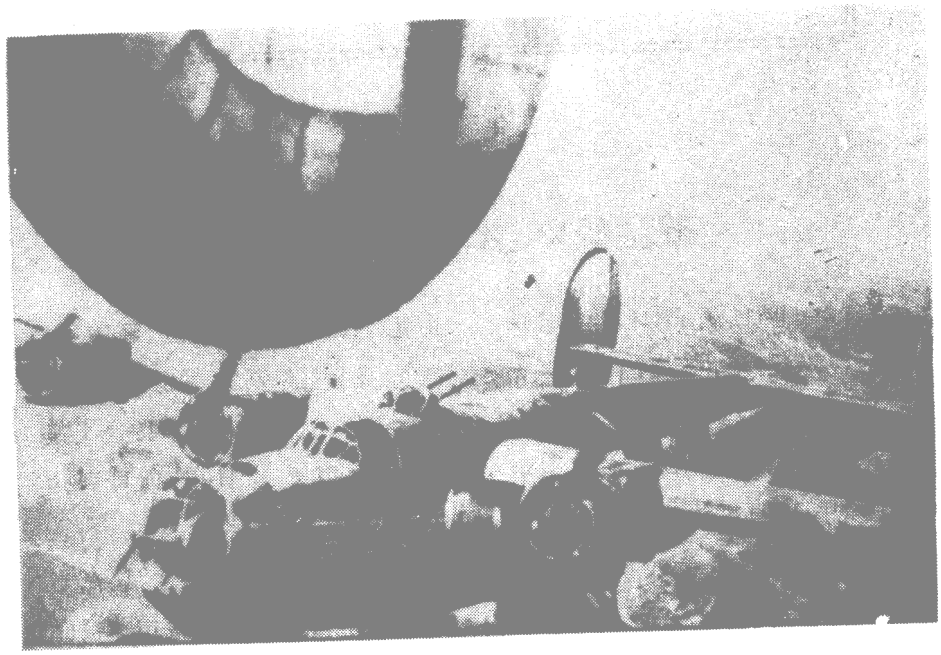
邓尼茨充分认识到德国潜艇的“黄金时代”已一去不复返了。他明白:他的潜艇处处会碰到护航队,德国潜艇已赶不上对方改进了的反潜措施。他也明白:在公海所进行的一次次决雌雄的实力较量中,他必须经受住更大的伤亡,要看护航队与“狼群”究竟谁先被挫败。尽管德国人击沉的船只的数量在增加,但是他们潜艇的损失太大以致难以支持。因此,大西洋的海战就以德国人的失败而告终。潜艇战就这样结束了,潜艇达到了邓尼茨——尽管他不能由此得到慰藉——所欲达到而未达到的最大成就。德国的战败是必然的。这是希特勒及德国法西斯的下场,也是他们无法明白和不愿承认的事实。

但是,通过潜艇战的考验,潜艇作为海军的一个主要突击兵力已成为另一个不可动摇的事实了。

在 50 年代中期,核动力潜艇的出现,使海上力量又发生了一场革命。潜艇一直在发展,可反潜技术也在发展,所以潜艇发展史不可能得出最后的结论。当今世界所处的形势,和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战前那些年月所处的形势并没有实质性的不同。那时,潜艇以什么方式影响海军的传统观念只有一个模糊的概念。现在,在先进的反潜技术下,在未来的海战场潜艇将会起到什么样的作

用，也存在一个模糊的概念。但可以肯定，一个没有强大潜艇兵力的海军，将会在未来战争中处于极其被动的局面。

（黄向明）



滇西临沧抗战轶闻

怒江烽火，大军云集临沧

1941 年 12 月，日本偷袭珍珠港之后，为封锁中国西南国际大通道，日军于 1942 年 3月 8 日占领缅甸首都仰光。 3月 12 日，中国应英国同盟军统帅卫菲尔之请求，经与美国协商，派出第 5、第 6、第 66 军组成的一支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远征军进入缅甸之后，虽经奋勇作战，多次重创日军，但因缅北地理条件恶劣，军队在雨季穿行于原始森林，热湿虫咬，传染病流行，造成被动局面。首先英缅军失利，继之，中国远征军遭到严重损失。入缅作战的 10 万中国远征军，伤亡很大，抗日名将戴安澜师长也英勇阵亡。剩下的部队有两个师向北退入印度国境，其余人员分中、东两路返回云南，中路一部退入滇西镇康、耿马等县境。日军遂乘机推进，经畹町、芒市、龙陵，占领腾冲县，直抵怒江惠通桥，气势逼人。如按这个速度推进，似乎十日内，即可到达昆明。

昆明是中国抗战的大后方，当时被认为是最安全的城市，顿时变得人心惶惶。中国唯一的国际通道——滇缅公路，也被日军截断。但是，日军长驱直入，深感兵力不足，在惠通桥沿岸，遭到中国军队的顽强抵抗，双方形成隔江对峙的态势。侵占怒江西岸的日军为第 56 师团，滇西临沧地区的正面之敌是第 56 师团所辖的第 56 搜索联队，占据龙陵县平戛和缅境滚弄一带。

日军兵临怒江西岸后，中国方面先后调第 11、第 20 集团军 17

个师 16 万余人集结滇西，北从丽江县片马，南至滚弄新地方（今沧源县正面缅境佤邦）约 400 公里的地段设防。今临沧地区境内由第 11 集团军第 2 军负责守备。军部驻顺宁县（今凤庆县），军长王凌云，辖第 9、第 76、第 93 师和新编第 33 师，部队配置在昌宁、顺宁、镇康（含永德）、耿马、沧源、果敢（缅境）一带，其中一部沿怒江东岸防守。第 6 军新编第 39 师、第 49 师，第 71 军第 87 师、新编第 28 师和军骑兵团各一部也曾过境和在耿马、镇康、沧源一带驻防轮战。仅镇康（含永德）驻军就达 2 万余人。真是“大军云集，卒伍遍野”。



中国陆军第 200 师中将师长戴安澜（1904—1942）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